鸦片战争:都是茶叶惹的祸

1699年,英国毛织品刚刚输入中国的时候,广州大班的记录中写到:“我们发现没有人想买它”。更悲惨的是,40年后,广州大班的记录中依旧写着,毛织品是“一件非常难卖的商品”。英国的产品在中国推销不出去,以白银换茶叶便成了英国与中国贸易的最重要内容。然而,在1807年,事情开始起了变化。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、马德拉斯、槟榔的英国殖民首脑,把原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到加尔各答。因为东印度公司已经找到了能在中国赚钱的商品,故而在广州的监委会,已经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了。这商品,便是鸦片。鸦片把英印中三国同时卷入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,而中国的茶叶成了牺牲品。

虎门销烟画像

白银换茶叶 造成中英贸易逆差

从18世纪后期开始,茶叶已经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,而世界上茶叶只有唯一一个来源,就是中国。茶叶几乎成了当时东印度公司唯一的进口商品。比如1830年到1837年,英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达3000万磅以上。与其他从事对华贸易的欧洲国家一样,英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: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?英国原本设想的用羊毛织物的销售来换取购买茶叶的款项,东印度公司甚至幻想,“一旦英国的‘手纺织物’打进中国这样的一个市场,英国就找到了实现繁荣的秘诀。”然而,美好幻想很快就被现实无情地打破。18世纪的中国经济高度自给自足,英国的毛织品始终在中国找不到广阔市场。

100多年后,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其《中国见闻录》中,还是这么写的:“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——大米;最好的饮料——茶;最好的衣物——棉、丝和皮毛。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。”当然,唯一例外的就是白银。欧洲国家只能用白银来购买茶叶。

一直到18世纪末,银元都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。银元通常被装箱运往中国,每箱4000个银元。1708-1712年间,英国人每年对华出口商品仅5000磅,而出口白银则高达5万磅。1765-1766年度,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%。到18世纪中叶,白银占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%,两国间的贸易逆差日趋严重。

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屡屡发生困难。1784年公司在广州尚有214121两白银的盈余,到第二年,就出现了222766两的赤字。1787年,赤字更高达904308两。

国际市场上的白银危机

欧洲并不是个盛产白银的地方,当时欧美国家输入中国的白银最大来源地便是西属美洲。

18世纪初,墨西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地。此后,美洲白银中的八九成,都由西班牙的“银船”运往欧洲。这些白银中的大多数,最终流向了中国。但银的产量毕竟有限,长期的恶性开采使得美洲银矿日渐枯竭。18世纪末美洲银产量开始下落。

1811年,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。这场持续15年的革命战争摧毁了很多银矿,美洲的白银产量大为减少。同时,独立运动开战后,殖民地不再向欧洲宗主国提供白银了。

因为拿不出较多白银来和中国进行茶叶的交换,大部分欧美国家只能淡出中国市场。然而英国人却顽强地在这个贸易地盘坚守了下去。

并不是英国人有办法解决美洲的白银短缺问题,英国彼时因为殖民活动的扩张,财政早已是捉襟见肘,甚至1805年,由于白银短缺,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伦敦运送白银到广州。

英国能够坚持下来,只因为他们把美洲的银元问题,在亚洲解决掉了。他们把中国的茶叶款项问题,在中国隔壁的印度解决掉了。他们找到了能攻入中国市场替代白银的东西——鸦片。

英国靠鸦片打了翻身仗

葡萄牙人最先将鸦片作为商品输入中国,不过规模一直很小,大概每年200箱。但这或许给了英国人启发,使他们看到了中国人市场上,除了白银外还有什么卖得动。

1773年,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、比哈尔和奥理萨独占了鸦片专卖。1780年,又将鸦片贸易全部垄断。

1781年,在孟加拉的华生上校写信给印度总督沃伦·黑斯廷斯,建议将孟加拉鸦片直接运到中国区销售,且由东印度公司垄断对中国的销售。

华生上校估计,仅在中国南方一些省份的销量就可以达到1200箱。这个收入非常可观,在广州缺现银和孟加拉当地鸦片滞销的双重压力下,公司董事会采纳了华生的建议,决定开启将鸦片走私进中国的事业。

在18世纪最后十年中,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2000箱。1800年以后,这个数直接翻倍。

从孟加拉到中国的鸦片贸易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商品交易线路。鸦片贸易投资少、利润高。通常鸦片在中国的销售相当于在印度离岸价格的5倍左右,扣除成本,获利仍非常可观。1818年,一个老鸦片贩子得意地说:“鸦片就像黄金一样,我随时可以卖出。”

1819年,鸦片价格大涨,鸦片代理商们写信给在加尔各答冒险发来大约25箱鸦片的一个胆小商人说:“我们诚恳地希望你所发来的能是十倍的数量。”

鸦片商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,英国政府同样也获得了高额利润,鸦片贸易的税收,占当时大英帝国税收的15%至20%。如果按照每箱平均价750银元,英国人等于是打了个翻身仗,鸦片贸易可以说是个一举两得的办法,既掠夺了印度资源,还解决了困扰英国多年的贸易逆差问题:印度鸦片在中国的销售收入,替代白银成了购买茶叶的支付款项。

现在,轮到广州不得不输出白银去购买鸦片了。单1807这一年,从广州运往加尔各答的白银就有2431000两。

通过鸦片,究竟有多少白银流出中国,各方面的统计不一致,新近研究表明,1807-1829年间,中国约有4000余万银元被英国人运出广州口岸,而1829-1839年间,中国的白银净流出量约为6500万银元。

正如当时一位美国商人所抱怨的:“鸦片贸易不但使英国人有足够的钱购买茶叶,而且使他们能把美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运回英国。”

清朝反击,鸦片战争爆发

值得英国人庆幸的是,鸦片每年都有很大的涨幅,而且在中国有很好的销路,购买中国茶叶花费的白银,转手又因为鸦片流回英国人的荷包。

这些鸦片给中国带来了什么?英国人自己也有感触。19世纪初,曾随英军来到中国的海军上尉奥特隆尼说:“中华帝国南部诸省的人民多半都是吸食鸦片成瘾的,那真是一大流毒,一大祸害。”

19世纪初以后的30年间,吸食鸦片的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,从城镇到乡村,从皇亲国戚到乞丐流浪汉,吸食鸦片者无处不在。更有甚者,军队也遍染吸食鸦片的恶习。据吉林将军祥康曾说,在沿海七省的官兵中,不抽鸦片的反倒成了例外。他们出征时常常身带两杆枪,作为武器的长枪经常生锈,而烟枪却被用得油光发亮。

鸦片败坏了国民的身体,消磨了人的意志,连累了无数人倾家荡产。更严重的是,由于大量的白银外流,造成银贵钱贱。19世纪初,一两白银约合铜钱1000文,到鸦片战争前夕,一两白银能换钱1600文。由于普通百姓平时流通的是铜钱,但是到交税时却必须要折成白银,大大加重了百姓负担,也造成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和金融混乱。

1838年,林则徐在调查苏州、汉口等商埠后上疏:“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,凡二三十年以前,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,今只剩得半数。问其一半售于何货,则一言以蔽之曰:鸦片烟而已矣。”

清廷经过激烈的争议,最终1839年,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,去往广州禁烟。这无疑是断了英国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发家致富之路,时任英国首相的美斯顿爵士毫不犹豫地对此诉诸武力。

1840年6月,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,清廷惨败。1842年8月6日,英国军舰进逼南京江面,坚船利炮面前,清廷不得不屈服,签订了《中英南京条约》。

福州开埠只为武夷茶

《中英南京条约》中的重要条款之一,就是要求中国开放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,实行自由贸易。从而使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地,并逐渐改变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。

起初,道光皇帝曾经打算用福建的泉州来代替福州开埠,但英国人坚决不同意。英国人要福州开埠,除了看中这里航运方便、手工业发达之外,最重要的还是看上了武夷山的茶。

武夷茶早在宋代就被列为贡品,明末清初时传至欧洲,备受上流社会欢迎。福州正式开埠前,英国商人购买武夷山的茶只能从广州,经过深入调查他们发现,武夷山距离福州仅150英里,顺溪流沿闽江南下,只需四天就可运达福州,运往广州的路线,至快也要四周才能抵达。因此在福州买武夷茶价格可以比广州低20%至25%。

所以英国处心积虑要把福州开埠,使福州作为茶路的新出口。这个阴谋先是通过鸦片战争的炮轰而开启,继而通过《南京条约》的签订而最终得逞。而这一切,如同鸦片战争的发动一样,就是为了攫取更高的利润。

19世纪全球化浪潮中,中国通过品质优良的茶叶同世界发生经济关联,而英国作为其背后的推进者,却是通过控制鸦片的生产和销售。正如一位善品中国茶叶的英国人的评述:“不列颠的旗帜从此成为保护无耻交通的海岛旗帜。”

据《国家人文历史》

在虎门销烟中,林则徐不仅烧掉了数千吨鸦片,也消弭了孱弱不堪的大清帝国在世人面前的败象。然而,即便如此,林则徐依然不能摆脱威权之下谎言的困扰,他在虎门销烟的同时,也本能地说些谎言。但就是这一系列的谎言,使得道光皇帝血脉喷张,龙威大震,并最终发布圣旨:断绝一切与夷人的贸易往来。于是鸦片战争的战火开始蔓延。

道光遭臣下蒙蔽

1839年7月9日,九龙炮战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,紧接着9月17日的穿鼻海战,首次交锋的清军以失败告终。但林则徐在向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却吹嘘到:“收军之后,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,内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,并获夷履等件,其随潮漂淌者尚不可以数计……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,已有十七具……受伤者,尤不胜计。”道光阅后龙颜大喜,当即朱批:“可嘉之至……既已大张挞伐,何难再视兵威。”同时道光帝鼓励林则徐要:“计出万全,一劳永逸,”断不可“稍形蒽畏,示以柔弱。”

但据史料记载,九龙海战,英兵无亡者,仅有四人受伤。清兵则死亡15人,而中国水师29艘战舰几近全毁。

辉煌的战绩通过奏折被送到了紫禁城,原本无心交战的道光帝被频传的捷报所激扬。于是战争向纵深发展。同时谎言还在继续。

1841年3月18日,英军攻入广州,由于前面的战斗清军屡战屡败,士气低落,所以未战先溃,但此时的新任参赞大臣杨芳在奏章里对失败绝口不提,反而说已屡败英军,唯恐其逃窜云云。

1841年5月初,各地援军相继抵粤,道光几次发出激昂圣旨“分路兜剿,务使该夷片帆不留”。21日,奕山下令对英军舰船火攻,英军略受损失。但清军却损失惨重,但奕山给道光帝的奏折中不仅对失败只字不提,反而满口胡言宣称打了大胜仗,并说英军举白旗乞和。道光得知龙颜大喜,并下旨允许其求和。

然而当定海失守之后,一直被蒙在鼓里的道光终于发现,包括林则徐在内的钦差大臣们用谎言编造出来的故事,使他在被不断愚弄之下一次次误判大局,致使鸦片战争不断升级。尽管道光曾秘谕当时的刑部侍郎黄爵滋亲赴前线暗中探实,但在一个以谎言构筑起来的行政系统面前,黄爵滋亦无力为之,他最终给道光帝奏折中只能无奈地采用当地官员的说法,因为谎言在当时已经成为惯用的行政语言。

据人民网